

# 河洛书院文化系列学习选刊

## 书院故事

2021 年第 2 期

河南科技大学河洛书院党委编

2021 年 3 月 10 日

---

### 前 言

自唐初至清末近 1300 年，7500 余所中国书院，遍布华夏广域，以求学问、成人之教、文武担当、经世致用为所求，创布德传道、人文化成、育才兴邦、服务天下之壮举，延东方之文脉，垂青史之典范。

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本学习选刊，将通过精选并讲述一系列中国古代书院故事，以期为大家体味、认知和理解“真”的过去，不忘本来传承千年书院的文化血脉，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国特色之路，引发思考，提供帮助。

为保证年代准确、史料真实和故事翔实，编者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网络百科文献资料，引用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。因水平所限，其中差错在所难免，诚待敬启者批评指正。

## 白鹿洞书院：以圣贤之心传播文明

白鹿洞书院，始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四年（公元940年），坐落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，静卧在山水灵动、云遮雾绕、层峦叠嶂之间，几进几出的大四合院建筑，布局相当考究，颇具清雅淡泊之气，是先贤立言、教化先民的学府之地。历史上，曾将白鹿洞书院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、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，合称为“中国四大书院”。

—

庐山，耸峙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鄱阳湖畔，以雄、奇、险、秀闻名于世，是一座集教育文化、宗教文化、名人文化和政治文化及外来文化于一身的千古名山。庐山之魂在文化，而庐山文化的精髓就是白鹿洞书院。

相传，唐德宗贞元年间（公元785-805年），河南洛阳人李渤（公元773-831年）与其胞兄李涉，在庐山脚下隐居读书，有白鹿形影不离、嬉戏于前，常听鹿鸣与书声相伴，和谐悠扬，更为苍松翠竹、青石流水增添了一抹浪漫。性情温顺、通人性、解人意的白鹿，被周边村民称为飞下天际陪伴李渤读书的“神鹿”，李渤也因此被称为“白鹿先生”。元和初年（公元806年），唐宪宗诏令李渤出山任职，李渤上书辞谢，不肯受官。后经当时声名显赫的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的极力劝说，李渤于元和九年（公元814年），出任江州（今九江）刺史。李渤就职后，公事之余，旧地重游，于此修建亭台楼阁，疏引山泉，种植花木，随成为一处人文名胜。由于这里山峰回合，地势四周高中间低，俯视如洞，遂得“白鹿洞”之名。五代南唐（公元937-975年）李氏父子，素来喜好诗文，于是下诏在白鹿洞建立学馆，称“庐山国学”，又称“白鹿国学”，即“白鹿洞书院”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，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，各地学子争相往之。

北宋初年，宋太祖赵匡胤（公元927-976年）、宋太宗赵光义（公元939-997年）及地方官吏都十分重视书院教育。为了促使书院教育更好发展，宋太宗赵光义下令将国子监刊印的《九经》等书，御赐给白鹿洞书院，使白鹿洞书

院名气大增。后官学兴盛，白鹿洞书院渐渐荒废。直到南宋淳熙六年（公元1179年），大理学家朱熹知南康军（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），率百官造访书院，当时书院残垣断墙、杂草丛生，早已没有了往昔的尊容，非常惋惜。朱熹亲自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，自任洞主，制定教规，延聘教师，招收院生，划拨田产，苦心经营，重振学风，使书院再度名家云集，溢满书香。然而，白鹿洞书院的命运绝非坦途，它以自己的沧桑记录着世事的变迁。元代末年，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。明代正统、成化、弘治、嘉靖、万历年间，先后进行过维修。进入清代，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，办学不断。光绪二十四年（公元1898年）清帝下令变法，改书院为学堂。光绪二十九年（公元1903年）停办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书院遗址曾遭火灾，藏书大部分损失。民国时期，书院也偶有修整，但终又日益颓坏。抗战时期，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曾表示白鹿洞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接管，作为中正大学的永久校舍，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。

## 二

白鹿洞书院以其悠久的办学历史，深远的文化影响，在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然而，真正奠定白鹿洞书院崇高地位、使之闻名海内外的是朱熹。另外，与朱熹同时代的理学代表性人物陆九渊、吕祖谦等，都曾在此讲学或辩论，这里一度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，成为播撒文明的文化高地。

**传习六艺，成就君子之教。**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核心目标诉求。在白鹿洞书院时，朱熹整理儒家经典，作注诠释，主张以传统儒家“六艺”经典作为教本。“六艺”之教，其实就是君子之教，它包含三个方面：对知识的探求、技能的培养和人格的熏陶。礼、乐同出于人心，相须以为用，有助于疏导人情，陶养心性；射、御能够训练体能，锻炼肢体协调能力，提高行动能力，有益身心健康；书、数是知识性的学习，锻炼智力和思维能力，在智慧的磨练中探索客观真理、学习知识技能。三者各自独立，又相辅相成，实现身心交融，以成人之教。通过修习六艺以滋养智力和情感，恢复人的本

性，澄澈心灵，达至融通无碍的境界。六艺蕴含不同的审美向度：“礼”体现中庸之美，“乐”内含中和之美，“射”展现力量之美，“御”蕴含技巧之美，“书”包含造型之美，“数”旨在培育智慧之美。“六艺”之教有其内在的关联与共通处，相互长益，相通相融，共同通向审美之境，成就君子之美。可见，“六艺”之教，蕴含人生至理，可以完善心智，使人获得审美欣赏的自由和从事创造的活动，重在引发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满足，是君子的人格教化，是书院教育修身成人的理想。

**崇礼尚义，提升情怀格局。**朱熹倡导读书、修身和济世的统一，摒弃门户之见，不局限于对经义的注解，更多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，重在辨明义理、思想交流，从而形成了自由讲学、自由听讲、自由论辩、深入探讨的讲学模式。在教学内容上：一方面，注重修习先秦儒家经典以开启心智，旨在构建涵盖宇宙生灵、符合万物运行规律的宇宙生命观；另一方面，提倡文史兼修的学习情怀，为学生累积了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济世情怀。书院以“人文化成”为理想，教学过程大多渗透着自修参悟之“化”的特点。书院所倡导的读书六法：循序渐进、熟读精思、虚心涵泳、切己体察、着紧用力以及居敬持志。“人之为人”是一个“化”的过程，从个体从生物性的人，化为社会性的、文化性的人，通过自身积极有为、自觉的日常践履，实现自我价值。书院讲究正心诚意的修身之道，倡导言语忠诚信实，行为笃厚敬肃，能够克制愤怒、抑制嗜欲、改正过错、不断向善。书院还倡导重义轻利，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君子忧道不忧贫”等教化内容。

**“白鹿”学规，高扬书院精神。**制定学规，明确书院办学宗旨，指示读书治学门径，规定进德立品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，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，是书院制度确立的标志，也是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。朱熹主持制定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又称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，十分强调书院的教育目的，不仅仅在士子个人的学术造诣、道德修养，还有传道济民安邦的更高要求，它是一个由道德、伦理、济世相融合的共同体，高扬经世济民、传道济世或传道济民的学风，明示了穷理而笃行的实践倾向，

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，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理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。据史料考证，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专门完整供书院管理使用的学规，也是岳麓书院等诸多书院的学规或制定学规参照的榜样，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，甚至传至海外的日本、南韩及东南亚一带而誉享海外。

### 三

白鹿洞书院，作为人文教化的结晶，自宋以后，忠义之士频出，无论是以身去国、抗疏犯颜的胡铨，还是坚决抗争、从容就义的文天祥，或是秉性刚直、面斥达官的蒋士铨，都彰显了堂堂正正的君子气节，传于后世，万古传唱。不仅如此，白鹿洞书院还培养了被李约瑟盛赞的“狄德罗”一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大科学家宋应星。

宋应星（公元1587-1666年），江西南昌府奉新县（今江西省奉新县）人，明朝著名科学家、思想家和哲学家。他出身于书香世家，少时便兴趣爱好广泛，遍读农学、医学、天文学等书籍，甚至对声学、工艺制造也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养成了不盲从、不唯书、不唯上的性格，在评价事物时极有主见。明万历四十三年（公元1615年），29岁的宋应星在乡试中以第三名的成绩高中举人，然而次年的会试之中却名落孙山。在落第之后，宋应星选择前往白鹿洞书院进修，以期下次再战。可未曾想，科场竞争激烈，此后一次又一次接连失败，宋应星便放弃了科举之念，往后的仕途生涯也未达到决策圈的显赫地位，但其对于学问的追求却从未松懈。饱受白鹿洞书院穷理而笃行的理学思想影响，宋应星注重实际，重视实践，专注于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系统总结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，著成《天工开物》一书。《天工开物》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，诸如机械、砖瓦、陶瓷、硫磺、烛、纸、兵器、火药、纺织、染色、制盐、采煤、榨油等生产技术，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著，有外国学者称它为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。

宋应星在对待事物的认知上，有的用试验的方法论去甄别，而非经验论；

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，把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、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的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，反映出一定的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，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、朴素辩证法。对于宋应星而言，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到属于中国古代文人的执念。这种执念，既有对于科举及第的追求，对著书立说的追求，更是对于自身品德上的追求。于是，即便是科举落第，宋应星却也成为了一位写下《天工开物》的大家，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，一位以身报国的忠贞之士，一位备受后世颂扬的历史人物，在他的身上，有着中国古人对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三不朽的完美呈现。

#### 四

新中国成立后，白鹿洞书院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，各级政府先后拨巨款进行三次大的维修，再度兴盛。在中华文化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传承中，书院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可谓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与载体。对于书院文化的阐发，我们既要回到历史的场景尊重其历史贡献，更要立足当下坚定现代教育的科学性，强调文明之间的相互通约与共识。回望历史，需要赓续千年文脉，但更要有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支撑，书院文化的传承意义大矣！